

新观察

刘建东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

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描摹

□金赫楠

打开刘建东的小说集《无法完成的画像》，董仙生迎面走来。这是刘建东近来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中短篇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男主角，是一个颇有些社会地位、掌握了大量行业和社会资源的成功者，世俗尺度上的“能人”，所到之处尽是掌声与鲜花。但同时，这又是一个“被梦想抛弃的人”，在妻子眼中他不过是“俗人一个，整日只知道拉帮结派，吃吃喝喝，结党营私，利益互换”，是“一个饥饿的人，疯狂地占有、攫取，梦想得到所有可以证明身份地位的证书、奖励、津贴，乐此不疲”——这是小说集中的中篇小说《丹麦奶糖》所精心描摹的人物形象。作为“董仙生”系列的第一篇，《丹麦奶糖》以主人公在单位和文化界中外在利益得失与内心自我冲突为主线，真切地呈现了这个时代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和精神处境。小说人物塑造的着力点在于那些发生于一个人内部的矛盾与分裂：“精致的利己主义”与理想主义，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与当下，世俗名利场中的沾沾自喜与午夜梦回时的惴惴不安……时代的巨大分裂与症候在这个人物身上充分彰显。

《丹麦奶糖》中，刘建东把董仙生置于三重目光之下：除了上述谈到的妻子不以为然甚至讽刺嫌弃的目光、董仙生自己充满矛盾的自视，还有刚刚获释出狱的大学同学曲辰的目光。20年的时间让曲辰从意气风发、激情澎湃的天之骄子变成了“被突然扔进来”的一个人，他在不属于他的时代里，曲辰成了彻底的失败者和不合时宜的存在，他对董仙生的崇拜、依赖、不解和潜藏在心底的愤恨，构成了第三重打量董仙生的目光和视角。而曲辰的出现，对董仙生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更是一种介入，从其看起来正得意洋洋、蒸蒸日上的世俗生活构成了一种突然的干扰与打断，董仙生正顺着惯性的成功人生发生了扭转和停顿，更开启了自己内心深处诸多的矛盾纠葛。小说中还有一组对应关系：眼前的苟且，诗和远方。小说的结尾，董仙生经历了世俗名利搏杀的失败，经历了曲辰带来的现实和内心巨大的波澜起伏，选择暂别眼前的苟且，重启诗和远方——远赴边远地区支教。

《丹麦奶糖》奠定了“董仙生”系列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人文知识分子的观察和表达视角，以及自我审视与自我辩解两种矛盾的情感立场之间的相互纠缠。当妻子和曲辰的目光构成对董仙生的一种冷峻审视和批判，当董仙生对沉溺于世俗当中的自己也产生怀疑和懊恼，我们的主人公总会忙不迭地罗列种种获得与成功，那些头衔、证书、邀约和“搞定”事情的能力，用以安慰、辩解和证明自己的成功——虽然这其中隐藏着丝丝心虚。正是在这种辩解

中，董仙生的前世今生、他的内心矛盾和灵魂闪烁，在作者笔下淋漓尽致地显形。

二 是的，人文知识分子。“董仙生”系列短篇小说中，处理的正是作者刘建东最熟悉、最切身的经验，是他自己身处其中的人生与人群。这本小说集中收录的另外九个短篇小说《猴子的傲慢》《声音的集市》《走失的人》《嘀嗒》《相见不难》《甘草之味》《春天的陌生人》《删除》《宁静致远》，贯穿始终的人物都是董仙生，它们也都在延续和延展着《丹麦奶糖》所启动的文学议题。

有的篇目侧重于书写董仙生自身的现实和精神生活，比如《走失的人》《声音的集市》《春天的陌生人》《删除》。有的篇目则着重于表达经由董仙生的目光和视角所呈现的人和事——自然，这目光和视角也就是董仙生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猴子的傲慢》《相见不难》《宁静致远》。《甘草之味》则以董仙生的童年视角讲述了父亲和姑父的故事，串联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理想情怀与功利主义的对峙，在这个过程中董仙生和作者并没有轻易给出简单的情感和伦理立场。而在《嘀嗒》中，董仙生更多成为一种功能性的人物设计，董所长一句“锁门”，搭建起一个封闭的相当于“舞台”的封闭空间，架设好舞台的灯光音美，然后文学所各色人等依次登场，一场饱含人性检验和撕扯的闹剧上演。面对一个时代和一个群体，董仙生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他在冷峻审视同时更在深情体恤疼惜。

刘建东迄今为止的作品中，我最看重这组“董仙生”系列。这个人物是作者自己身处的人群，是他最熟稔的人生与生活，每个故事里头都饱含着作者自己最切身的痛痒、焦虑和疑惑。而且，恰也因为这身在其中的熟悉与熟稔，这些小说中的不确定、不坚定和犹疑、迷惑也最强烈。小说中的董仙生，他本就是与我们身边的某个熟人，或者，就是我们自己。当下文学现场的小说写作中，大家更愿意、更长于去书写乡村、底层，各种爱之深、责之切，各种深入开掘和南腔北调。而一旦面对自身，往往却不知道如何开口、从何说起，真正能够深情又诚实、冷峻地凝视自身的作品太少。知识分子处理和表达自身经验的语调和目光，往往容易失之刻薄，失了体恤和悲悯，而对任何人群和事物，文学所秉持的正应该是深刻批判与深切理解的合力。刘建东笔下今时今日的董仙生，也许正是我们曾经极其厌恶、但不知不觉就活成了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某些人想活成还未得的样子。这个人物身上携带、包含着复杂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人情、人性张力，意味深长。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其最可靠的路径又是什么？”

三 贯穿于这一系列小说当中的，除了董仙生这位主人公，还有“荒诞”。

《丹麦奶糖》中，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董仙生隔三差五就会收到快递来的一盒丹麦奶糖，“寄件人那一栏是空白，没有姓名和地址”，莫名来处的一盒盒奶糖，逐渐成为主人公的心病。“这盒奶糖让我心神不宁，思想本能地向不好的方向滑行”，他不断地暗暗分析、试探和排查着可能的寄件人和寄送目的，却始终没能找到答案。陆续收到的神秘奶糖将董仙生笼罩在一种“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某种不祥预感”之中。小说结尾，老同学曲辰再次入狱，单位里的职务争夺也尘埃落定，围绕董仙生的诸多纠葛恩怨都暂告一段落，可唯有丹麦奶糖的寄送之谜仍未得解，不知所终。而在小说《相见不难》的开头，董仙生开会时偶遇自己的初中女同学崔瑞云，这场老同学间的偶遇充满着不确定甚至荒诞感。这位女同学在小说结尾处身份未明，于是这交集、这讲述，都变得很有些虚幻。《嘀嗒》中莫名失踪又莫名回来的书稿，构成这篇基本生发和支撑；《声音的集市》之中那个盲女孩煞有其事讲述、而在现实中并未发生的讲座；《走失的人》中莫名而来的老人和无端固执的女警察……《丹麦奶糖》中着力营造的神秘与荒诞感，在这些篇目中反复出现，并且直到小说结束时，作者和叙述者都没有为读者解惑，依旧是“幽暗不明的真相与记忆”，显然作者在有意留白。

上述情节和人物设置，于现实逻辑和文本逻辑之下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荒诞感。这也正是刘建东小说一直以来最具辨识度的文本特点，“荒诞使我对真实的把握更加地放松”，他不止一次表达类似的观点。刘建东的小说在叙事策略上，是将命运、人生、焦虑等抽象无形的东西形象为奶糖、文稿等等，他所沉迷和依赖的“荒诞”，不是荒唐走板，而是自己认定的触底



人和事的可靠路径。但有些时候，他必须要求自己克制，再克制。

四

《无法完成的画像》是小说集中唯一一篇无涉“董仙生”的作品，这是刘建东近几年来小说创作中的力作，进一步展示了作者卓越的文学思考和表达能力。小说中的“我”作为炭精绘画学徒，目睹师傅为一位失踪了的母亲画像的几经波折，以及师傅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失常表现，最终画像却无法完成。直到小说结尾画像的未解之谜才被打开，原来，这位母亲和绘画师傅都是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他们那些不为人所理解的言行才有了解释，悲壮的革命人生也渐次清晰起来。“无法完成的画像”是讲述人“我”心中一直牵肠挂肚的未解之谜，从叙事策略来说这个悬念搭建起了小说的基本结构，波澜起伏中故事和人物节奏得以把控，更从侧面塑造了大脚母亲的形象——抛家舍业、忠于信仰的革命烈士。小说处理的是历史风云中一段极具体、甚至边缘的个体经验，但又分明是英雄儿女的家国天下与风云际会。作为读者，我们得以见证，在无言、忘我、坚毅与勇敢背后，每一个革命者原本的人生角色；义无反顾的壮烈牺牲背后，他们舍弃的那原本理所应当又无比珍贵的安稳人生。

“无法完成的画像”被选作小说集的题目，也许还另暗含一层隐喻——前面十篇中短篇小说，董仙生贯穿其中，它们从不同面向在为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甚至时代精神的局部画像，但画像远未完成。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自己，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黯然、怯懦、迷惑和躲闪，有时让人不忍直视，但又似乎情有可原。他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基于其自身立场的合理性又在哪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其最可靠的路径又是什么？

■短评

宏大叙事的价值与常道

——丁晓平《人民的胜利：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读记 □傅逸尘

系和运作规律的深刻认知。丁晓平以夹叙夹议的笔法，讲述了全国土地会议筹备与召开的过程，讲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的前前后后；尤其是对于土改过程中“左”的错误强力纠偏、毛泽东对于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作家的叙述既宏观又精微；既介绍了中共高层对这一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又书写了农村百姓对相关政策和共产党政治理念的接受过程。在这种互动和砥砺中，揭示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成功执政的最重要的基础。

《人民的胜利》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深度解读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和逻辑；以《前夜》《翻身》《决战》《统战》《外交》《开国》等6个篇章结构全书，从政治、经济、军事、统战、文化、外交等方面全景式地立体展现中国共产党紧紧团结、依靠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的历程；以多维度、全方位、大历史的视角，再现了新中国成立的创业史、奋斗史，完整地告诉读者，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人民的胜利”，既是这本书的写作主题，也是铺展在这段宏阔历史之下的政治和精神底色。

在丁晓平看来，“历史是教科书，也是圣殿，更是我仰望的星空。在历史写作中，我始终怀抱敬畏之心、仰望之情，不敢造次，一路仰望，满怀赤心。”斯言诚哉，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

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无论回溯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都是紧密且缠绕的，两者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进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和达成思想与情感层面的共识。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借鉴吸收了党史、国史、军史研究的新成果，佐以权威的史料与丰富的细节，挖潜深究，博采众长，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编年史的写作套路；书中的人物群像与恢弘历史相得益彰，将民族记忆、家国情怀以及超越个人、超越死亡、超越极限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达得充分、生动而有说服力。

丁晓平关注和书写的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题材——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他坦言，“我的历史写作选题，被许多作家朋友们视为写作‘禁区’，诸多党史事件、党史人物也是大家不想甚至它也不敢触碰的领域。的确，历史写作有其特殊的难度，是一种有限制的写作，是更需要想象、智慧和才情的写作，有‘自由中的不自由’。然而，我在坚持‘文学、历史、学术跨界跨文体写作’的道路上，获得了‘不自由中的自由’。”丁晓平对于创作的自道与剖析，提示出“立其大

者”的意义和价值。“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而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逸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新时代文学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

对于文学而言，“大”标示的往往是常道，历史有常道，文学有常道，人类的精神亦有常道。诚如谢有顺所言，是常道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常道在持续建构和塑造一个民族的性格。常道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去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从中，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做出大肯定，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大时代的发展走势，无法从具象中梳理出现实生活的内在脉络。在丁晓平看来，“归根结底，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也是一种文化观和价值观。”

写作《人民的胜利》，丁晓平以坚定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内省的审美眼光和生动鲜活的表达，为读者呈现历史真相的同时，也把历史事实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思想智识的部分传递给读者的历史。所谓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有利于民族、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那部分历史。当然，其中包括对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的反思，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守住生命的立场，切中时代的脉搏，肯定世界的意义，建构思想的共识，这是宏大叙事的价值，也是文学书写历史的常道。

■关注

从民国诗歌到共和国诗歌，江苏诗坛的文学地理伴随文学制度的变动，也在迅速的嬗变之中。江南文化气候在作为文化精英的诗人诗作中的显现，仍然是和旧诗模糊的地理边界相呼应。诗人们的故土属性真正显示为“江苏意识”的极少。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诗人们开始从国族的笼统归属和东西南北的方位归属，逐渐在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中转换为居住地的省市行政区划归属。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普遍化特质也决定了江苏诗歌的地域化特征难以深潜到地域文化性格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在省际行政区划的范畴内圈定的诗歌地理，亦难以呈现出地方性。直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商品化大潮的冲击，诗歌隐匿在时代物质主义的潮流之下，诗人群落在民间改写了主流化的聚集方式，相应的文化空间也逐渐带有亚文化气息。这种地方风格的积聚在21世纪变得更加明显。

江苏诗歌作为共和国新诗发展的文化地理单元，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美学的多样化体现与共和国文学的整体状况有颇多应和之处。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上世纪50—60年代的共和国颂歌、人民颂歌和新生活颂歌的写作期，60—70年代的低迷与沉寂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复兴期，以及80—90年代的繁荣期和21世纪20年来江苏诗歌地方性的逐渐成型。江苏诗歌在四个阶段的发展中，逐渐实现了诗歌地域特色的复归和诗人个性的彰显。

1949年到1966年，江苏诗人们与其他诗人一样，加入了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比较活跃的诗人有戴云远、赵瑞麟、沙白、忆明珠、孙友田、黄东成等。诗人们热情洋溢地展现自己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颂，用洪亮的合唱将个人的声音纳入了集体的合唱中。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伴随着社会动荡，江苏诗歌出现了一个低潮期，诗人们几乎停止了歌喉。在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推崇并培育社会主义大合唱的全民诗情，并形成一股洪流，整合了来自于不同区域文化生态的诗人，对文坛进行了深刻再造。江苏诗坛也汇入了这股洪流之中。对闻捷、路翎、高加索、化铁、章品镇、王若渊、丁芒、鲍明路、戴云远、赵瑞麟、沙白、忆明珠、孙友田等诗人诗作形成的江苏诗歌版图进行解读，可以看到以萌生于延安的红色诗情为主流，江苏诗歌毫无例外，也加入了这场宏大的颂歌合唱。闻捷诗歌的红色血统使他能快速汇入时代，成为诗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良好范本。《山歌散歌》的讴歌劳作是以西域为背景的，但在语言风格和审美气质上，呈现出江南和美格调。

在当时，其他“江苏诗人”亦如闻捷一样，在大众化抒情的整体趋势中，为一种热烈而趋同的集体生活歌唱，“个体”的存在主要显现为诗歌中携带的浅层的地域特色。与闻捷相比，带有“七月”诗学背景的江苏诗人化铁，则显示出某种同样为时代所吹拂的昂扬意气。江苏诗歌在上世纪50年代的存在引人注目，带有最大程度的个性化语言的闪现，诗行在同时代诗人中卓尔不群，为江苏诗歌保留了诗美的火种。这种语言倾向深植在很多知名诗人终生的创作中，即使在后来“新归来诗人”的写作中，也能看到“众口一词”的公共语习惯已经成为这一代诗人难以摆脱的话语命运。江苏诗歌在新生共和国需要战歌和颂歌的时代，作出了自身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这也预示个性化语言和抒情美学人格恢复的道路同样漫长而艰巨。

抒情主体的颂歌人格长期成为江苏诗坛的显著特征，也是江苏地方性难以成型、诗人聚落不具有自发契机的主因。直到1978年底，诗人们的创作热情才再一次被唤醒，焕发出歌唱新时代的昂扬意气。江苏诗歌在新时期的繁荣，配合了这一文学复苏的潮流，赵恺、王辽生、朱红曾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新诗奖，他们成为江苏诗歌首批“归来的诗人”；受知青诗歌和朦胧诗潮的影响，一批年轻诗人也在崛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江苏诗歌，风格延续政治抒情诗和朦胧诗的格调，为80年代中后期江苏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随着80年代校园诗歌的兴盛，一大批校园诗人引领了江苏诗歌的主流，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先锋姿态。其中，包括中学生在内的校园诗人，为江苏诗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0世纪后半叶，江苏新诗的地域个性经历了由共性的集体呈现到个性的逐渐显现的转变。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他们”诗派，成为江苏诗歌一个真正的同人群体，其在实质上长达40多年的存在，对江苏诗歌（乃至整个江苏文学）意义重大。1985年，于坚、韩东、小海、丁当等诗人创办了《他们》诗刊。1995年《他们》出版第9期，最后一期《他们》结束。围绕诗刊的创办，形成了以南京诗人为主体的“他们”文学群落，拢聚的诗人 and 作家、艺术家有吕德安、普珉、于小韦、朱文、吴晨骏、陆忆敏、杨克、刘立杆、杜马兰、朱庆和、李楠、顾前、曹恩、毛焰等人。该诗歌群落作为一个特殊的民间文学社区，涌现出较多优秀作家、诗人，对江苏文学的后续发展影响深远。1989年春，车前子、周亚平、黄梵、一村、周俊、朱君等人组建“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创办诗歌刊物《原野》，引起了较大影响。

韩东是上世纪80年代后率先进行文学话语革新并获得成功的诗人之一。这表明文学已经初步具有了对“文革”美学损伤的自我疗愈能力，但这并不是文化的反叛，而是语言的反叛。韩东是较早有意愿地把诗歌拉回平民社会的诗人。他一直寻找口语与艺术、平民生活与深刻潜质的契合点。长达30年的话语求变，使作家很少属于自己的语言，而类似韩东诗歌中抒情主体的解放能够最终引起诗语的重生。抒情者形象是低调的、沉默的，对于高亢的语调和感叹词都非常排斥。韩东希望触及到汉语的诗语本质，恢复真正属于汉语的表意功能或诗歌功能。他以崭新的不同于外倾的抒情方式，沉默、隐忍、喜怒不形于色，专注抵达细节，建立与世界的新关系。

20世纪90年代末的“断裂”事件将江苏诗人作家对文学语言的探询引向深入。由此可以看到一种较为新颖的诗语，抒情姿态和风格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预示了江苏诗歌在21世纪的多元发展。2016年，何言宏、张维联合发起了对江南诗人的诗学命名——“江南七子”，对陈先发（安徽诗人）、胡弦、潘维、鹿玮、杨键（安徽诗人）、叶辉、张维等七位诗人进行了地方性诗学的探讨。这是一次由民间文化人士和上海高校研究者联合部分诗人促成的对江南诗歌地方性美学的提取，似乎提示在文学个性化的积累中，新诗的地域性格先于其他文体有了形成的可能。叶辉、胡弦、鹿玮等诗人的语言版图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建构主体，对江苏省的审美精神形成反哺。这些探讨“江南美学”的新诗行动，在由车前子、黑陶、育邦、李德武、苏野、戴北、王学忠、李楠、陈虔、苏省、张羊羊、丁可、丁捷、成秀虎、麦豆等诗人构成的江南线索上，重绘了江苏文学的文学地图。策展人朱朱以其优异的语言天赋和艺术感力，在年轻一代诗人和艺术家中间示范了新诗语的优势潜质。孙冬、少沉、高兴等诗人参与的“新九叶诗人”的缔造令人瞩目，再度提示诗人翻译作为地方性诗学的救赎之源。沙克等人发起的对“新归来诗人”的诗学观察，对更多长久保持诗心的诗人投以注目礼。在江苏高校体系内，学者诗人们的诗学交流日趋密集，莱莫、李章斌、李海鹏、马永波、王珂、戴潍娜、义海等也将江苏塑成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诗学中心。当然，苏北、淮扬等地的诗人，也于新的语境中体现了自身对日常的眷恋，汉语语义在苏宁、王往、曹利民、张作梗等诗人身上有新的个体生发，也很难不被视为一种地方性的诗歌态度，他们皆是一个在不断延伸中的江苏诗歌地图的令人心动的局部。

新诗地方诗学的省际视野

□傅元峰



丁晓平是一个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历史自觉的军旅作家。在新作《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以文史兼修的视角细腻爬梳新中国成立的来龙去脉；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聚焦鲜活的生命个体，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大历史中的小插曲、小人物；将国家立场与民间记忆、文学叙事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清晰而有力地阐释并彰显了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丁晓平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强烈的现实观照。在《人民的胜利》中，丁晓平用大量的篇幅、详实的数据和史料说明并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党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始终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翻身》这一章，丁晓平以1947年2月10日晚，在延安，斯特朗和毛泽东之间的一场对话展开叙事。“你对取得最后的胜利有过怀疑吗？”“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毛泽东的回答旗帜鲜明、信心十足，这种自信源自于他对土地改革问题的深入调查研究，源自于他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关

